

耳聽為虛,眼見為實

——晚清出洋士人的西方印象

邵 建

[提 要] 鴉片戰爭後,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少數有識之士開始“開眼看世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親眼目睹和親身感受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的風土人情,甚至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科技發展、社會結構及文化習俗進行細緻考察。這些出洋士人群體形成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最早、最直觀的印象和感受,儘管並非全面深刻,但對晚清時期中國人了解、認識和學習西方,從而推動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 晚清 出洋士人 西方印象 中國近代化

[中圖分類號]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71 - 12

鴉片戰爭以後,時局遽變,少數有識之士(包括部分思想比較開明的官員)開始“開眼看世界”,謹慎、仔細地審視自己一貫鄙視的“外夷”,甚至迫切渴望了解陌生而又難以捉摸的西方世界。庚申之變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走出國門,親眼目睹、親身感受英、法、德等西方國家的風土人情、經濟和社會。他們——晚清出洋士人群體——形成了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最早、最為直觀的印象。儘管這些印象可能並非全面深刻,但對於晚清時期中國人了解西方、認識西方和學習西方,從而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學界雖已就該議題展開諸多討論,但聚焦於晚清士人群體西方印象的系統性研究並不多見。張宇權的《論晚清傳統士大夫對西方的認識及其外交主張——以劉錫鴻為例》^①、龐乃明的《明清中國負面西方印象的初步生成——以漢語語境中的三個佛郎機國為中心》^②和周寧的《天下辨夷狄:晚清中國的西方形象》^③,雖然以中國人對西方的印象或認識為研究對象,但並未將晚清出洋士人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有些學術成果涉及時人西方印象的某些方面,如許爭爭的《清末遊歷與出使歐美官吏對西方教育的導入(1860-1911)》^④,郝維鋼的《早期出洋官員對中西文化的認識》^⑤,白新萍的《晚清士大夫的英國觀》^⑥,一言的《1840 年代中國人的德國觀——以〈海國圖志〉和〈瀛寰志略〉為例》^⑦等。也有一些學術成果探究《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中有關西方的描述,如劉勇的《〈海國圖志〉對美國的介紹》^⑧,王發志、劉漢東的《從〈海國圖志〉看魏源西洋觀的局限性》^⑨,郭春梅的《從〈瀛寰志略〉看徐繼畲獨特的對外認識》^⑩,趙毅、孫琳的《清代朝鮮燕行使的“西洋印象”——以〈燕行錄全集〉為中心》^⑪等,由於這些研究文本的作者並未親歷西方世界,因此他們所

表述的西方印象基本上是對文本或口述知識的梳理歸納。美國華裔學者皇甫崢崢的新著《遠西旅人——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通過考察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等六位出使歐美使臣的書寫模式，揭示了清政府如何逐步重建與西方列強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體系，研究角度較為新穎。^⑫

除史學研究領域外，從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對晚清出洋士人日記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術成果也有不少。如尹德翔的專著《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⑬以文化身份、文學形象學、傳記研究為主要切入點審視晚清使西日記，探究出洋使臣面對陌生西方文化時的情緒和心理，並進一步解釋他們對西方文化存在不同看法的原因；陳長房的《蠻荒天堂：中國人的美國觀（1784-1911）》主要探討了此階段中國人對美國的幻想、印象和評價^⑭；雷俊玲的《清季首批駐英人員對歐洲的認識》^⑮則以郭嵩燾、劉錫鴻、黎庶昌、張德彝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他們面對西方文化時的反應與差異。有關晚清出洋士人及其日記的研究成果還有很多，此處不贅。

一、中國人了解西方是時代需要

明清以後，中央政府實施嚴厲的海禁措施，中外之間特別是中西之間原有的交流逐漸沉寂。到鴉片戰爭前，中國與西方世界的交流主要局限於廣州和澳門。但這幾百年間，整個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的催化下，西方世界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逐漸跨入資本主義階段，並基本完成對東亞以外區域的殖民化。同時，東西方之間的科技、軍事差距逐漸拉開，形成代際性鴻溝，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冷熱兵器的強烈反差。遺憾的是，在鴉片戰爭之前乃至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意識到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了解西方世界真實情況的中國人鳳毛麟角，只有為數不多的開明士紳對西方進行了初步而膚淺的了解與介紹。林則徐、魏源、徐繼畲、梁廷枏等人通過借鑒前人成果、翻譯西書或與西人對話等方式，將所得內容彙編成晚清第一批介紹西方風土人情、政治地理的書籍，如《四洲志》、《海國圖志》、《瀛環志略》、《海國四說》等。這些著作對西方現實情況的介紹，並非基於作者在西方旅行和生活的經歷，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知識轉述。儘管如此，它們對於當時幾近“與世隔絕”的中國人了解西方和外部世界，依然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徐繼畲的名著《瀛寰志略》就產生於這一時代背景之下。該書比較全面地描述了世界地理和歷史，介紹了世界各大洲近 80 個國家和地區的疆域、種族、人口、沿革、建置、物產、風土人情、宗教等，圖文並茂，互為印證，尤其是較為詳細的介紹了對清朝威脅最大的英、法、美三國的情況。熊月之先生認為，《瀛環志略》是“一部適應時代需要的……映照出近代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努力汲取新知識的新動向，代表了那個時期中國研究世界地理的最好水平”^⑯。該書甫一面世便受到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如魏源將其作為增補《海國圖志》的重要依據和借鑒。據統計，《海國圖志》有 33 處內容直接引錄自《瀛寰志略》，總計近四萬字。道光、咸豐年間，讀過此書的內外大臣為數不少。尤為難得的是，劉韻珂、劉鴻翱、彭蘊章等當朝大員紛紛為該書作序。曾任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的劉鴻翱讚譽此書為“百世言地球之指南”。福建道員鹿澤長稱，該書“於國家撫馭之策，控制之方，實有裨益”。^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務運動興起，《瀛寰志略》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1866 年，總理衙門重刊此書。1867 年後，京師同文館將其列為教科書。1870 年代以後，該書成為中國出洋官員的必備讀物。此後，該書越來越受到開明知識分子和士紳群體的推崇，郭嵩燾、薛福成、王韜、曾國藩、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日記和著作中對《瀛寰志略》和徐繼畲皆有高度評價。

作為中國第一位出使歐洲的外交使節，郭嵩燾將《瀛環志略》視為了解西方的重要資料。但他

最初以為此書講述英法諸國之強言過其實，直到他出使英法，親眼目睹傳說中的西方世界後才感嘆：“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⑧有“中土西來第一人”之稱的斌椿，不但請徐繼畲為《乘槎筆記》作序，而且還這樣寫道：“自古未通中國，載籍不能考證，惟據各國所譯地圖，參酌考訂，而宗以《瀛環志略》耳。”^⑨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薛福成、王韜等人也對此書推崇備至，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梁啟超早年也都讀過《瀛寰志略》，並從中接受了新的世界觀。康有為說：“（讀了該書後）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夷狄，複讀《海國圖說》、《瀛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礎。”^⑩梁啟超則說：“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⑪由此可見，《瀛寰志略》等著作對於中國人初步認識和了解西方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儘管這批著作屬於知識的轉述，卻使一些中國人對遙遠的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模糊的或者粗淺的認知。

在鴉片戰爭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中，雖然有了解西方世界的客觀需要，但絕大多數中國人面對西方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國傳統的天下觀，當然更難以放下長期存在的自尊。劉鴻翱雖然對《瀛寰志略》推崇備至，但仍不忘強調“夫中國，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四肢也。”^⑫劉氏這樣說，或許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或政治氛圍有關，但其所體現的固守以中國為天下中心、以中國之外為四夷的觀念還是比較明顯的。千數年來，中國封建士大夫一直認為蠻夷之地尚未開化，“夷夏之防”斷不可逾越。對於當時有關西方世界的種種傳聞，多數人只是道聽途說，不以為然。一些守舊人士仍將西方先進的科技產品視為“奇技淫巧”，王公大臣和名士們還停留在“聞洋人之長便怒，聞洋人之短則喜”的扭曲心理層面，更不用說學習外國語、與外國人共事或到外國遊歷了。早在道光年間（1847年），商人林鍼便赴美教授中文和遊歷，後寫成《西海紀遊草》一書，但稿本只在廈門、福州等地流傳。當時到海外謀生或遊歷遠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這樣一本遊記自然不會受到重視。林鍼遠赴美國遊歷“九萬里”，甚至被很多人視為不孝。因此林鍼特意在書末附有《記先祖妣節孝事略》，稱自己雖然“時在海外”，但仍時刻“追思往昔”。^⑬而其赴美的目的，更是因為“家甚貧，白髮在堂，無以為養”，故“乘風破浪，孤劍長征，將以博菽水資而為二老歡也”。^⑭

《瀛寰志略》出版後，書中部分內容即遭到眾多保守派猛烈攻訐。李慈銘甚至痛斥其“聽信夷書，……誇張外夷，尤傷國體”。^⑮中國保守知識分子的傲慢與偏見可見一斑。當時洋話被斥為“南蠻鴟舌”，洋文被責為“旁行斜上”，如果有人學洋話、說洋話、寫洋文，就是“儒者之恥”和“非聖無法”。在那個愚昧、保守的年代，能夠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需因應國際形勢作出全面調整的人寥寥無幾，大多數知識分子仍固守傳統，擔心“用夷變夏”。保守勢力對於辦外交更是不屑，當郭嵩燾奉使歐洲時，有人寫下一副譏諷的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一些湖南同鄉更是覺得其此行有辱家鄉聲名。儘管清政府接連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敗北，但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堅守“夷夏大防”。對於一些固執已見的保守人物來說，他們依舊如鴛鴦般不願接受一個早已超越東方的西方世界。正如費正清所認為的，“在對外關係方面，十九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家和社會仍然認為自己是東亞文明的中心。它和周圍非中國人的關係是假定以中國為中心的優越感這一神話為前提的。……和中國皇帝只能保持藩屬關係這種觀念雖然不時受到重創，但一直延續了下來。”^⑯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晚清中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勢不可當地走向近代。儘管封建觀念的制約和束縛力量依然強大，但在當時形勢下，中西之間的交往已遠非朝貢體系中的中外關係。中國人放下“天朝上國”的自尊，遵循“國際規則”與西方打交道勢在必行。1861年，清政府設

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866年2月20日,奕訢為派員考察上奏曰:“查自各國換約以來,洋人往來中國,於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國情形,中國未能周知,於辦理交涉事件,終虞隔膜。臣等久擬奏請派員前往各國,探其利弊,以期稍識端倪,借資籌計”^②。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了消除“隔膜”、“周知外國情形”的必要性,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走出國門,去真正了解那個遙遠卻又不得不面對的“蠻夷”世界。於是,1866年斌椿、張德彝出訪歐洲,1868年志剛、孫家穀使團赴美國,1870年崇厚專使法國,1872年起中國幼童赴美留學,1876年郭嵩燾、劉錫鴻出使英國,繼而郭出使法國、劉出使德國,1878年曾紀澤出使英法並赴俄國,1890年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1887年,清政府通過考試選派傅龍雲等12名遊歷使分赴四大洲20多個國家進行了為期兩年多的考察,他們撰寫了上百種考察報告和遊歷筆記。落後保守的中國人走出國門開眼看世界,恰如林鍼在《西海紀遊自序》中所發出的感慨:“去日之觀天坐井,語判齊東;年來只測海窺蠡,氣吞泰岱。眼界森臨萬象,彩筆難描;耳聞奇怪多端,事殊誰記?”^③王韜不無得意地回顧自己旅歐期間在牛津大學講學的經歷:“三百年前英人無至中國者;三十年前,中國人無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視中原如堂奧,無他,以兩國相和,故得至此。”^④在過去,中國人坐井觀天,將外面的世界想像為蠻荒之地,而現在,這些出洋士人終於有機會直接接觸西方,儘管他們的所見所聞只是整個世界的冰山一角,但在此之後,數百年來橫亙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帷幕終於被緩緩拉開,中國人的西方印象也在東西方不斷的交流與融合中逐步調整、修正和清晰。

二、出洋士人對西方的初步印象

隨著時局變化及國門洞開,越來越多的人基於各種原因得以親赴西方一探究竟。這些人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因經商需要,如遠赴英國參加倫敦世博會的浙江絲綢商人徐榮村,以及受邀赴美遊歷的林鍼等人;第二類是政治避難或逃亡者,如因上書太平軍而獲罪逃亡的王韜,因戊戌政變而逃亡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第三類是官方派遣人員或求學者,如留學生、駐外公使及隨員等,相對於前兩類來說,這一類人數更多。可見在那個歷史時期,能夠踏出國門前往歐美者大多數並非普通人,他們基本上都是在當時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士紳階層。這些曾遊歷或生活在歐美國家的人士,構成了近代中國最早接觸和了解西方的群體,即晚清出洋士人群體。他們詳細記錄了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思所想,並以遊記、日記、詩詞等方式彙編成書,留諸後世。從他們留下的豐富著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群體對西方世界的了解程度、總體印象和基本立場。

當然,這些近代早期出洋士人對西方世界的印象、認知和心理,都經歷了一個基本相似的變化過程,即都由最初“道聽途說”的難以置信,到“眼見為實”後的驚訝與讚嘆,再到“心嚮往之”的豔羨,甚至產生了向西方學習的強烈願望。換言之,出洋士人對遠比中國發達和文明的西方世界的印象與認知,經歷了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的過程,有一個從感性認識逐漸過渡到理性思考的過程,區別只是在於對西方文明的認可度與接受度。事實上,對於這些出洋士人來說,在最初接觸到真實的西方世界時,首當其中的就是要面對、思考甚至質疑深入骨髓的“華夷之辯”或一直被奉為主臬的“華夏中心”論,而“天朝上國”的自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

1867年初,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遭通緝而避走香港的王韜,應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往遊泰西,佐輯群書”之邀,於同年12月離港赴歐,至1870年4月返回香港,前後遊歷歐洲達兩年半之久。在長期與西方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王韜已逐漸從一個深受傳統影響、持守“華尊夷卑”觀念的舊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推崇西方科技、制度、貿易等,倡議“以彼所優,供我之用”,接受

和倡導西學的開明知識分子。^③但從他遊歷新加坡時發出的“我中朝帝德之長涵、皇威之遠播”等言論來看,至少在當時他仍未跳脫“華夏中心論”的藩籬。王韜的這種看法,體現出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心態,與他早年參觀墨海書館時如出一轍。當時,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請他喝了從未喝過的葡萄酒,看了未曾見過的樂器,聽了從未聽過的音樂,但他覺得這酒“味甘色紅,不啻公瑾醪也”,這樂“抗墜抑揚,咸中音節,雖曰異方之樂,殊令人之意也消”。^④從這兩句話不難看出王韜對西方文化懷有防範之心。而王韜疑慮西方人有可能見利忘義,所謂“夷性無常,一旦見利所在,不能不保其敗盟也”,^⑤就更能說明彼時其內心“華夷之辨”的意識依然強大。

隨同蒲安臣出使美國的志剛,在參觀了萬獸園後大開眼界,讚嘆其“珍禽奇獸,不可勝計”,但思想保守的他仍然發表了一番難以自圓其說的“高論”：“雖然,博則博矣。至於四靈中麟、鳳,必待聖人而出。世無聖人,雖羅盡世間之鳥獸而不可得。龜之或大或小,尚多有之。龍為變化莫測之物,雖古有豢龍氏,然昔人謂龍可豢,非真龍。倘天龍下窺,雖好如葉公,亦必投筆而走。然則所得而見者,皆凡物也。”^⑥志剛雖目睹了西方現代文明,也並不否認其先進之處,但卻將動物園裡展示的動物與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龍、鳳、龜、麟四大靈獸進行關聯,認為其“世無聖人,雖羅盡世間之鳥獸而不可得”,極為牽強附會。志剛的心態,既反映出其思想保守與自尊的一面,也反映出他對西方文明的防範和盲目排斥。

王韜、志剛等人的心理活動,在那個歷史時期具有非常普遍的代表性。但隨著出洋士人待在西方的時間越長,經歷和見識的日益增多,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最終都放下了不合時宜的傲慢或偏見,轉而去欣賞自己所看到的真實的、先進的、文明的西方景象。王韜在英、法兩國長期生活及遊歷之後,對西方的看法和印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最重要的體現,是他在日記中除了介紹當地的風土人情外,出現了更多具有批判性、洞察力和思想性的文字。法國和英國是當時整個西方最發達、最強盛的國家,它們的經濟、文化、科技都處於世界前列,遠非王韜此前所經歷過的南洋小國和埃及可以比擬。這裡一片繁華景象,完全超出了王韜的想像和認知,所以他感嘆“始知海外闐闐之盛,屋宇之華”,“抵法埠馬賽里,眼界頓開,幾若別一宇宙。……逮至倫敦,又似別一洞天。”^⑦到了馬賽才知道,原來世界上竟然還有如此繁華之地;及至抵達倫敦,就像到了另一個世界。可想而知,當一直生活在農業中國江南小城的王韜,初見西方大都會的繁華景象時,會受到多大的視覺衝擊。一個又一個歐洲繁華之都相繼出現,印象持續加深,歐洲的城市文明必然會給王韜帶來極為深刻的震撼與思考。在西方日久,王韜逐漸放下中國士人的“面子”,虛心向洋人請教,“每日出遊,遍歷各處。……各處督理主者,無不一一指授,間有所問,導者輒譯余意以對,應答如響”;“隨有辨論,主者嘆為明慧淵博”。^⑧這樣一個觀察入微、不恥下問、長於思辨的人,對於西方世界和西方文明的認識必然比一般人深刻,他心中的西方印象也逐漸得到豐滿和充實。想像中的“蠻夷”之地和自以為物產豐富的天朝之間的對比與反差,強烈的視覺衝擊和難以置信的親身體驗,促成了其內心深處的顛覆性變化,並以不同的形式、行為或言語表現出來。

斌椿在親身體驗了火車之迅捷後,讚不絕口。他甚至假設,周穆王如果知道火車之妙,必將推而廣之:“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車轍遍寰區。”^⑨斌椿在馬賽登岸時,對其繁華景象和入宿酒店的先進設施非常驚嘆,在筆記中特別介紹了電梯、傳聲筒等設備:“登降勞苦,則另有小屋可容六七人,用火輪轉法,可升至頂樓。屋有暗消息,手一按,則櫃房即知某屋喚人。傳語亦然。各法奇巧,匪夷所思。”^⑩自馬賽踏上歐洲大陸,斌椿便開始了法國之旅。隨後,他搭乘火車前往里昂和巴黎,結果發現里昂“繁盛倍於馬賽”,而巴黎“街市繁華,氣局闊大,又勝於里昂”^⑪。他甚至感嘆“醉裡不知

身作客，夢魂疑是住蓬萊”^③。對於這段在西方大開眼界的經歷，斌椿唯恐國內讀者質疑其有誇大之嫌，故在《乘槎筆記》後記中特地加以說明，“所經各國……宮室街衢之壯麗，士卒之整肅，器用之機巧，風俗之異同，亦皆據實書，無敢傳會”。^④

儘管斌椿極少在行文中對自己在西方的所見所聞加以深入討論和評價，甚至還用牽強附會的表達方式歌頌朝廷，彰顯傳統儒家思想，但我相信，其真實想法或許深埋於內心深處。讀斌椿的《乘槎筆記》及詩兩種，無論是內容或是文風，都能反映出此次開國人之先河的歐洲遊歷，對於他而言是愉悅、難忘的，也是引以為傲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斌椿對西方世界的美好印象，只能透過詩詞這種相對樸素的形式進行較為克制的展現，這一點從他讚美西方白人女性的眾多詩歌中可見一斑。《海國勝遊草》收錄了斌椿赴歐途中和遊歷歐洲期間所作的 71 篇長短不一的詩詞，其中直接或間接描寫西方女性之美的約有 12 篇。如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斌椿來到德國漢堡，原天津稅務司威立士夫婦以及威立士夫人的姊妹設家宴款待斌椿。席間，夫人姊妹彈琴唱歌用以助興；臨別時，夫人姊妹還特地贈送相片予斌椿。對此，斌椿記述：“其夫人姊妹皆善歌，能鼓琴。臨行，各增照像一，眉目秀麗，竟如其人。攜之中華，恐二喬不能專美千古”。^⑤不僅如此，斌椿還作詩云：“新月纖眉細柳腰，風姿綽約態難描；歸帆載得江東去，不數當年大小喬”。^⑥可以想見，在多才多藝、婀娜多姿的西洋女士陪伴下，心情愉悅的斌椿對德國人和德國的印象是美好的，而那個美好的夜晚也必定令人難忘，回味無窮。而與瑞典王妃（荷蘭公主）互贈禮物，更是令斌椿引以為傲的事情。據《海國勝遊草》所記，王妃很欣賞他的才華，兩人相談甚歡，斌椿以書扇贈之。當斌椿抵達普魯士首都伯爾靈（即柏林）時，竟意外收到了瑞典王妃寄來的信和像片，斌椿非常開心，賦詩一首：“開緘奕奕見真仙，珠玉光輝下九天；何幸瓊瑤報芹獻，歸裝珍重好流傳。”^⑦同樣的，這位王妃在斌椿眼中也異常美麗，以至於看到像片就如同看到“真仙”一般。

有意思的是，從以上未免略顯香豔的日記和詩詞來看，很難想像作者斌椿是一個自稱“處事多齟齬”、“稍長性更迂”、飽讀詩書的 63 歲老人。從這些抒發情感的詩句，不難看出斌椿對這段旅程所持的美好印象，甚至有如魚得水之感。畢竟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一個 60 多歲的老人漂洋過海遠赴歐洲，所面臨的體力、精力、心力的困難和挑戰可想而知。事實上，斌椿不僅適應了這段旅程，還感到非常享受，與洋人的互動和交流也非常好。其中緣由，除了斌椿自身的適應和交往能力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西方的發達文明和西人的熱情好客，讓他很容易接受且樂在其中。

真正直面西方的近代文明，即便一直被視為守舊人物的劉錫鴻，初見倫敦的繁華景象時也驚嘆不已：“衢路之寬潔，第宅之崇閎，店肆之繁麗，真覺生平得未曾見也。……入夜，各街燈燭攢光，火山星海，殆無以過。”^⑧郭嵩燾則如是評價倫敦夜景：“街市燈如明星萬點……闐闐之盛，宮室之美，至是殆無復加矣”。^⑨隨使龔照璦的吳宗濂初抵馬賽時，即因從未見過的豪華酒店景象而感嘆：“各房金碧輝煌，電燈照耀，乍見之，幾疑為天上瓊樓”。^⑩

西方都會城市的繁華景象，給出洋士人帶來視覺和感官上的衝擊與震撼，而工業革命所催生的器物層面的巨大變革，無疑會給他們帶來更多新奇和思考。志剛在美國看到鐵索橋時頗為驚嘆：“飛空鐵橋之法，無慮河面百數十丈之寬……為奇觀，為快事，奇而法，快而穩，懸空而堅實，能矣哉！”^⑪它不僅僅是一座鐵索橋，而是一座上層鋪鐵軌能通火車、下層能走車馬行人的雙層鐵橋。相對於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採用的旱廁或隨意尿溺，志剛使用了抽水馬桶之後，不僅稱讚它衛生便捷，甚至還將其與世間大道聯繫起來進行了一些思想闡發，這與長期以來許多守舊人物對西方先進器物視而不見或將其視為“奇技淫巧”的無知態度有天淵之別。^⑫斌椿、郭嵩燾、劉錫鴻、志剛等人普

遍對西方世界的城市景觀與工業文明持欣賞和讚嘆的態度，他們既驚嘆於陌生、繁華、美麗整潔的都市風貌，又折服於工業革命催生的新式器物與機器製造，這種雙重認知幾乎成為當時出洋士人群體的共識。

三、出洋士人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評價與認識

如果說出洋士人們對西方城市風貌或器物層面的欣賞與讚嘆只是一種浮於表面的、感性的東西，那麼，西方發達的現代文明和西人較高的素質則是不得不認可的理性的、內化的、深層次的東西。同時，如果說西方城市的面貌和先進生活方式構成了出洋士人西方印象的大致輪廓和框架線條，那麼，對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城市社會生活的更深層次的理解和認知，則為這幅印象畫填充了內容和色彩。

志剛在巴黎遊玩時對公共綠地的描寫很有意思：“順途而上，為大宮。前為禁園一段，其外接長林……凡都人之嬰童幼女，任於其中往來嬉戲，有歡娛長養之趣。而置之於大宮之前，頗有意味。”^④這裡的“大宮”應該指的是 Palais-Royal，原為紅衣主教黎塞留的私人住所，後成為國王財產，時為波拿巴家族的居住地，宮前有大型噴泉、綠樹林立的步道以及皇家花園，供市民休憩之用。志剛認為此舉“頗有意味”，顯然他對法國的這種做法進行了深入思考，也給予了一定肯定。與志剛一樣，王韜也特別欣賞歐洲的公園綠地。在巴黎觀光時，他看到法國王宮周圍“大道廣衢，四通八達。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間之，圍以鐵欄，廣約百畝，盡栽樹木，樾蔭扶疏”，而“遊者亦得入而小憩，蓋藉以疏通清淑之氣，俾居人少疾病焉”^⑤。描述倫敦的城市狀況時，他再次提及市民公園：“市中必留隙地，以助間隔，約寬百畝，闢為園囿，圍以木欄，環植樹木，氣既疏通，蔭亦清涼，無偏窄叢雜之虞。每日園丁灑掃灌溉，左右鄰皆有管鑰，出入自便”^⑥。政府專門在城市闢設公園綠地，有專人管理養護，普通市民能夠自由出入，或漫步休憩，或遊樂健身。但這在中國絕對是不可想像的，花園或者園林向來是皇家、王公大臣、富賈大戶才可能享有的私產，普通老百姓無福享受。中國真正的市民公園，是近代以後受到西方影響，才逐漸由開放的口岸城市擴展開來的。西方城市文明的氣息撲面而來，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文藝演出、公共設施、市政建設等各種現代文明元素，讓那段時期的出洋士人目不暇接，印象深刻。

王韜在巴黎參觀了博物館、陳列館、萬國博覽會址，並參加影戲、舞台劇、魔術、舞會和馬戲等文體活動，對法國的文學、藝術、體育、市政管理等有了進一步了解。他對盧浮宮博物館嘆為觀止，詳實描述了盧浮宮內展出的生物、植物、寶玩、名畫和製造，字裡行間充滿了讚嘆之情和羨慕之意。特別是在介紹製造時，王韜對西方的技術發展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到：“巨者如行水舟艦，大小畢具……往遊者無不興觀止之嘆。余以海角羈人而得睹其盛，不可謂非幸已。”^⑦此外，歐洲的市政建設和公共服務設施，也給王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曾這樣描寫巴黎：“歐洲一大都會……甲於一時，殆無與儔。居民百餘萬，防守陸兵三十萬，按街巡視，鵠儀嚴肅，寂靜無嘩；此外亦設巡丁，密同梭織。立道左，無不威寓舍宏敞，悉六七層，畫棟雕瓦，金碧輝煌。”^⑧可見，王韜對西方城市整潔有序背後的社會管理和城市治理已經有了初步了解，並對此表示肯定與欣賞。

當然，除了城市文明的各種表像外，給出洋士人帶來深刻印象的還有西方人普遍較高的素質。旅英期間，王韜曾向一位在火車站工作的老人請教與火車相關的問題，老人談吐不俗，顯示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職業和知識素養。^⑨西方主要國家經過工業革命後的長期發展，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體系化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閱讀郭嵩燾日記最直

觀的印象,就是他比較注重參觀考察英國的學校、醫院、教會、博物館等文化教育機構。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對英國教育成就和科技發展的評價是“學問日新不已”⁵⁶,非常中肯。郭嵩燾是一個求知欲很強的人,也是一位頗具開新思想的官員。他曾赴教會學校客來斯阿士布達洛學館參觀小學生晚餐,在認真聆聽並了解唱詩班的餐前合唱後,郭嵩燾說:“聞此歌辭,亦足使人忠愛之意油然而生。三代禮樂,無加於此矣。”良好的教育和社會規範的薰陶與規訓,必然會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除郭嵩燾外,劉錫鴻對此也頗有體會。在歐期間,他曾親歷了兩件事情,使其對英國人較高的個人素質有了深刻印象。他在日記中如實進行了記載:

隨員張斯枸之跟役入市採買,路遇本土醉人,以肱戲擊其顛,落帽。巡捕共擒是人,送羅地美亞審辦。美亞以中國使者憩駕甫數日,士人遽敢妄為,從重羈管兩月示懲,並刊布新聞紙,令眾力同護使署隨從人等。郭正使致書德爾秘,請以其醉戲寬之,仍未得釋。又前在北紹爾舟中,有附載洋客訶詈余僕,掌船者見之,到亞丁遽逐洋客於岸,亦經余為之討免,乃罷。向疑英人僻處海島,惟知逞強,無敬讓之道。乃上下同心,以禮自處,顧全國事如此。⁵⁷

劉錫鴻所經歷的第一件事,是無端攻擊中國使館隨從的醉漢,被英國警方逮捕,並被法庭定罪。當地報章不僅報導了這起事件,還呼籲民眾保護使館人員。另一件事,在一次旅途中,劉錫鴻的僕人遭到一洋人無端責罵,船主遂驅逐罵人者。張德彝在《隨使英俄記》中對這兩件事均有詳細記載,兩文對照,可知劉錫鴻所言屬實。⁵⁸透過這兩起事件,劉錫鴻不但承認了自己原以為英國人只知炫耀實力、不知禮讓的觀念是錯誤的,而且相信整個英國都有敬讓之風。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對英國的印象無疑是比較正面的、積極的。當然,劉錫鴻作為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人物,不可能像隨同他出使德國的錢德培那樣思想活躍。錢德培是一個留心觀察、善於思辨的年輕人,他並不完全認同當時洋務派一味求強求富的做法。他認為,中國欲富強,“首在正風俗”,即“境無閒民”,“民心固結”。他所主張的“正風俗”儘管遠未涉及根本性問題,但已涉及整個國民素質的提升,所以他說“惟兵強尚屬末務,終須於教養入手,方可正辦。否則,敷衍文章,消磨歲月而已”。⁵⁹張德彝對此頗有感觸:“倫敦間巷之間,終日往來男女,既無傴僂提攜,亦無前呼後應,更無手提雀籠者。雖值盛暑,鮮有露胸袒背赤腳科頭者。”⁶⁰

四、出洋士人對西方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初步思考

出洋士人在國外生活與工作的時間越久,就越有機會深入接觸和了解西方社會及其政治制度。對此,他們在日記中都多有描述,甚至不乏比較深刻的認識和評價。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郭嵩燾和王韜。

郭嵩燾初至英國時,對其議會制度頗不以為然,他說:

此間國事分黨甚於中國。現分兩黨,新執政畢根士非爾得(亦作比干思福義),舊執政噶拉斯敦。下議政院入畢黨者四百餘人,入噶黨者三百餘人,互相攻擊爭勝。而視執政者出自何黨,則所任事各部一皆用其黨人,一切更張。其負氣求勝,挈權比勢,殆視中國尤甚矣。⁶¹

郭嵩燾描述的其實就是英國的議會制和兩黨輪流執政。在他看來,兩黨之爭並無是非,只是純粹的派系鬥爭,而且這種黨爭比中國還要激烈。劉錫鴻對此也有同樣的看法,他在評價英國首相由議會選舉產生時說:

英國宰相之進退，視乎百姓之否臧。而眾官之進退，又視乎宰相之進退。持其失多者，則當國謝去，公舉賢能，告諸君而代之。相既易，則各曹長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應靈動。進必群進，退必群退，故常相傾軋，有一利必有一弊。^②

初來乍到的郭嵩燾對英國政治制度的了解是非常粗淺的，但了解日深，他的看法就有了很大改變。光緒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郭嵩燾在日記中對英國議會做了比較深刻的反思：

計英國之強，始於國朝……其初國政亦甚乖亂。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③

除此之外，郭嵩燾對國際關係、國際法、選舉制度等政治議題也有不少思考，他感慨：“西洋以智力相勝，垂二千年。麥西、羅馬、麥加迭為盛衰，而建國如故。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力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④郭嵩燾的這些言論，不但表明他基本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同時也毫不隱晦地批判了中國的君主專制，難能可貴。有比較必然有反思，就連劉錫鴻在旁聽了英國議會的會議後，也對英國的此種制度大加讚賞。他在日記中不僅介紹了此次會議的緣起、儀式、會場擺設、議員服裝、王室儀仗等，還對其進行了一番正面評價：

凡開會堂，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辯論之久，常自晝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官政乖錯，則舍之以從紳民，故其處事恒力據上游，不稍假人以踐踏。而舉辦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其令，斯力無不殫也。^⑤

不僅如此，在英國日久，劉錫鴻對英國社會制度優越性的認識也越來越深。他在日記中對英國的政俗做出了非常坦率的評價：

到倫敦兩月，細察其政俗，惟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全未之講，自貴至賤皆然。此外則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

兩月來，拜客赴會，出門時多，街市往來，從未聞有人語喧囂，亦未見有形狀愁苦者。

地方整齊肅穆，人民歡欣鼓舞，不徒以富強為能事，誠未可以匈奴、回紇待之矣。^⑥

在這段論述中，劉錫鴻對於英國“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進行了詳細介紹，其中不乏溢美之詞。例如，在談到“無虛文相應之事”時，他說：

有職役則終其事則不惰，有約令則守其法而不渝。欺誑失信，等諸大辱。事之是非利害，推求務盡委折，辯論務期明晰，不肯稍有含糊。辭受取與，亦徑情直行，不偽為殷勤，不姑作謙讓。男女盡人皆然，成為風俗。^⑦

不難看出，劉錫鴻對英國人的規矩、直率和不虛偽給予了極高評價。與郭嵩燾和劉錫鴻一樣，王韜也特別留心英國的各種制度，並在《漫遊隨錄》中用大量篇幅介紹英國的議會、教育、專利等制度。在倫敦期間，王韜專程前往英國議院參觀，旁聽議事。他說：“有集議院……國中遇有大政重務，宰輔公侯、薦紳士庶，群集而建議於斯，參酌可否，剖析是非，實重地也。”議員需要確定大政方針時，就開會商議，辯論觀點。與中國相比，更能體現集體智慧與決策的科學性和優越性。另外，英國議會“閒暇之日，門庭肅靜，亦許人進而遊覽焉”。^⑧在愛丁堡，他訪問了當地法院，親自觀摩了庭訊，對

英國法庭審判的公平、公正和公開深表嘆服，認為有“與眾僉同”的中國古風。在碧福(Bedford)，他探訪了監獄，發現“居舍既潔淨，食物亦精美”，不但環境整潔，犯人的伙食也非常好。他還看到，“獄囚按時操作，無有懈怠……且有牧師來宣講，悉心化導之”，感嘆“獄囚獲住此中，真福地哉”。^⑨英國的教育體系給王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歸納出一點就是“英人最重文學”，重視國民教育。“童稚之年，入塾受業。至壯而經營四方；故呈賤工粗役，率多知書識字。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曆算、象緯、輿圖、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窮研，得其精理。”^⑩兒童不分男女，適齡即入學接受初等教育，到成年之後基本都能夠知書識字，這對一直處於“男尊女卑”社會的王韜來說，無疑是一股清涼之風。王韜對法國、英國的專利制度讚不絕口，評論尤佳，認為“其法亦良善也”，能夠激發人們的創造性和積極性，“故人勇於從事也”^⑪。

錢德培對德國的描述和評價也很有啟發性。如關於德國的政治體制和議事規則，錢氏介紹說：“凡政令，議於下，決於上。下議院紳以各鄉邑之富紳充之。……會議則以允者過半為定。下院定議，則上之於上議院，上院定而批決於君，然後施行。……苟民之所之願，必相辯駁，以理為曲直，不以尊卑定可否也。”^⑫錢德培還介紹了德國的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強制兵役和徵兵方面的制度法規：“凡男女六七歲即入學堂讀書認字，父母任其遊蕩者，罰。幼孤或無力者入官塾。稍長至十四五，則分習他藝，操作有定時。……平民年至二十即充兵，在營三年。惟殘廢者，可免學習。文官者，可免。在營滿者，各歸本業。遇事則隨時徵調。寓兵於農工商賈之中。”^⑬對於德國的肖像權保護，錢德培說：“西人極喜照相，故凡帝王將相名人高爵之相，遍列市肆，任人購買。然未經本人允准者，雖尋常人之相，倘有私售，亦可控告科罪。”^⑭此外，錢德培還記錄了數萬市民前往皇宮問候被刺德皇、次日又慶賀德皇安然無恙的事情。^⑮相信這一事件會加深他對德國的整體印象，同時也會引起他的一些思考：一是數萬民眾可以前往皇宮聚集問候皇帝，這在北京紫禁城禁地絕無可能發生，清政府最恐民眾聚集滋生事端；二是民眾聚集問候被刺德皇，足以說明德皇在民眾中的威望和受擁戴的程度；三是德皇親出慰問民眾，也說明德皇非常願意親近民眾，這與久居深宮、隔絕於百姓的清朝皇帝截然不同。

蔡鈞出使西班牙時，也看到過類似的君民同樂情形，如“嘉那華會(嘉年華)……(遊行)即逢君主君后之車，亦無所避，主后亦並優容以答之，笑談無忌，普慶臚飲，此亦古者與民同樂之遺意也……西俗如此，由來久矣”；^⑯“君主乘車出遊，貧民在道旁脫帽致敬，君主亦必答之以禮，不恃貴以賤民，有古遺風焉。”^⑰德國和西班牙的君主與民同樂，這對於一向受到嚴格規制訓練的錢德培、蔡鈞等人來說，顯然不可思議，所以蔡鈞也只能從中國的上古傳說中尋找答案，將其歸之為“有古遺風”。還是郭嵩燾一語道破了錢德培、蔡鈞等人的不解或思考，他與法國公使一起陪同巴西國王欣賞音樂會後感慨：“西洋君民尊卑之分本無區別，巴西國主至捨其國遨遊萬餘里外，與齊民往還嬉戲，品花聽樂，流蕩忘返，亦中國聖人之教所必不容矣”。^⑱的確，在等級森嚴、禮教甚嚴的中國，此種情況怎麼可能發生呢？

餘 論

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中國陡然被拖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明知識分子群體開始反思此變局的原因及應對策略。為有效應對西方列強，中國必須深入了解其實際情況，然而當時東西方對彼此的了解極不對稱。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已相當深刻，而中國對西方幾乎一無所知。郭嵩燾曾痛切指出：“通市二百餘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熟習其語言文字者”。^⑲奕訢也提

到,“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僞,中國一概茫然。”^①面對此局勢,一批開明士紳通過“道聽途說”,試圖脫開以中國為天下中心的傳統觀念,重新審視未知的西方世界。林則徐、魏源、徐繼畲、樑廷枏和姚瑩等人成為這一探索過程中的時代先驅。盡管他們對西方的理解與現實存在較大差距,但他們“開眼看世界”的努力為後人了解西方提供了初步參考。

隨著歷史的推進和西方侵華壓力的加大,中國人與西方的接觸成為不可避免的時代課題。郭嵩燾、薛福成、斌椿、曾紀澤等官員,以及以王韜為代表的口岸知識分子,紛紛前往西方,成為深入了解西方的先行者。然而,由於傳統觀念和思維定勢的限制,部分人即使親眼目睹西方的先進,依然堅持天朝的自尊。如王之春在《使俄草》中依然稱西方為“夷”。^②錢德培在議論西方格物之學時,雖然表現出對西方的了解,但仍帶有明顯的華夏中心觀念。他對西方的評價有失偏頗,甚至說出了“非我中國統轄地球不可”、“統一地球,盡歸藩服”、“統地球而一之,其惟我中國乎”之類的癡話。^③郭嵩燾出使英國前,曾向翁同龢鼓吹洋務,翁非但不以為然,反而認為其觀點不切實際:“其以電信、鐵路為必行及洋稅加倍、釐金盡撤者謬也,至援引古書,伸其妄辯,直是失心狂走矣”。^④

然而,接觸、了解和學習西方是中國面臨的時代挑戰,傳統的天下觀並未能阻遏更多中國人走出國門與西方交流。早期出洋士人群體的形成,標誌著中國人在西方印象構建上的實質性進步。中西文化持續交流,使得此前陌生的文明逐漸為大多數人所認知,中國人對西方科學、技術及制度的理解在不斷加深。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和思想觀念在變動不居中得到昇華,西方印象也日益清晰。

這一複雜的變動過程經歷了較為漫長的過程。從鴉片戰爭前後對西人“性同犬羊”和西方世界遠未開化的愚昧想像,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被迫正視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並開啟以洋務運動為核心的“同光中興”,再到甲午戰敗後維新變法呼聲此起彼伏,以及清末新政後向西方學習幾乎成為社會共識,標誌著中國人對曾經的“蠻夷之地”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最終,中國不僅承認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性,也開始在各個領域向西方學習,從而開啟了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化進程,為中國最終實現民族救亡和國家獨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①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5期。

②長春:《史學集刊》,2019年第5期。

③長沙:《書屋》,2004年第6期。

④瀋陽: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⑤天津:《歷史教學》,2004年第11期。

⑥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⑦北京:《歷史檔案》,2012年第3期。

⑧瀋陽:《蘭台世界》,2016年第10期。

⑨安徽淮北:《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⑩太原:《太原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

⑪瀋陽:《遼寧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⑫皇甫崢崢:《遠西旅人: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汪林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⑭Chang-fang Chen, “Barbarian Paradise: Chinese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4-1911”,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5.

⑮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99年。

⑯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頁。

⑰⑱徐繼畲:《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3頁;第3頁。

⑲方聞編:《清徐松龕先生繼畬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07頁。

⑳斌椿:《乘槎筆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頁。

㉑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翦伯贊等編、中國史學會編輯:《戊戌變法》第四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第116頁。

②①梁啟超：《梁啟超文選·三十自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365頁。

②③④⑤林鍼：《西海紀遊草》，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50頁；第33頁；第39頁。

⑤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480~481頁。

⑥參見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⑦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621頁。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韜：《漫遊隨錄》，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六），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97頁；第59頁；第82、99頁；第96~97頁；第84頁；第101頁；第91頁；第83頁；第116~117頁。

㉞王韜：《攷園尺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32頁。

㉟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121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志剛：《初使泰西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第293~296頁；第283頁；第280頁；第306頁；第384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斌椿：《乘槎筆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第163頁；第107頁；第108頁；第165頁；第144頁；第124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斌椿：《海國勝游草》，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第172頁；第177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劉錫鴻：《英軺私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七），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70頁；第74頁；第84頁；第83頁；第109~110頁；第

110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四），長沙：岳麓書社，2008年，第99頁；第159頁；第133頁；第101~102頁；第407頁；第236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吳宗濂：《隨軺筆記》，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第80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七），第293~294頁、第314~315頁；第534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錢德培、李鳳苞：《歐遊隨筆·使德日記》，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第82頁；第16頁；第17頁；第13頁；第26~27頁；第73、78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郭嵩燾：《使西紀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六），第111~112頁；第149頁；第107頁；第91、115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蔡鈞：《出洋瑣記》，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第15頁；第17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郭嵩燾：《請廣求諳通夷語人才摺》，見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一），第409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之春：《使俄草》，鍾叔河等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2016年，第29~30頁。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翁萬戈編：《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222頁。

作者簡介：邵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
上海 200235

[責任編輯 陳志雄]